

# 閱兵儀式與身體政治

吳佩芳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解嚴前的國家慶典活動，所營造萬眾一心的現場氛圍和莊嚴的儀式感，是一段國族歷史的縮影。本文希冀以技藝下的閱兵身體為觀察視角，辯證臺灣的節日政治與儀式政治的關係，探討國家形象的塑造，進而梳理「國慶儀典」的儀式過程。其次，藉由觀看國民政府遷臺後的國慶儀典過程，梳理閱兵儀式中的表演／儀式行為，探索表演者的身體性，進而建構閱兵儀式的原型。可以發現，透過我是我／非我的閱兵身體、反結構狀態下的閱兵訓練、儀式行動與「轉化」經驗，皆讓我們對於閱兵儀式「操演」階段，以及閱兵步法「表演」階段的屬性與特徵，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最後，本研究以廣義的「表演」論述，探討閱兵儀式的表演，並從儀式空間與權力展演、權力的彰顯與馴服、卡里斯瑪現象，重新檢視閱兵身體的空間化發展，進而觀看臺灣的空間戒嚴與權力的關係。

**關鍵詞：**國慶、表演、身體政治、閱兵儀式

# Military Ritual and Body Politics

Pei-Fa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atmosphere of all people united on the site and the ceremonial solemnity of a national celebration event before the martial law ended are like an epito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litary ritual body with good skill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iday politics and ceremony politics, explore the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image, and further summarize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ceremoni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national ceremony processes aft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relocated to Taiwan,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performances / ceremonial behaviors in military rituals, explored the performers' bodiness, and further constructed the prototype of military rituals. It was found that, based on the military ritual body of me being me / not being me, the military ritual trainings in the anti-structure state, ceremonial action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ransformation", our insights into the properties and features of the phases of military ritual "demonstration" and military ritual footwork "performance" were deepened. Lastly,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gener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military ritual performanc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alization of military ritual body from the aspects of ceremonial space, power demonstration, power manifestation, docility, and the charisma phenomenon, and further look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forcement of martial law of space and power in Taiwan.

**Keywords: national celebration, performance, body politics, military ritual**

## 壹、前言

國慶儀典可以塑造國家的榮耀及尊嚴，亦可視為凝聚國民認同的國族場域，與此同時，它也可能隨著臺灣主體意識高漲，淪為執政黨與反對黨立場互異的競演舞臺。在總統蔣中正與蔣經國領導的黨國體制下，「國慶日」在凝聚全民共識、社會動員、廣電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所營造萬眾一心的現場氛圍和莊嚴的儀式感，所投注的心力與資源是值得書寫的一段時期。先秦典籍《左傳·成公十三年》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既為祭祀，也稱祭典。戎，兵戎，既為兵器、軍隊，也指涉戰爭。在連年征伐的春秋戰國時期，從一國之君到平民百姓，儘管連年遭遇諸侯爭霸，征戰頻繁，但「兵戎」卻成為國家安內攘外，伸張正義的工具，戰爭也被賦予「止戈」為「武」的意涵<sup>1</sup>。

當我們透過時空的交錯與記憶的銘刻，回到 1950、1960 年代的閱兵大典上，從祭祀到戰爭，國慶閱兵大典究竟是窮兵黷武展示軍威，亦或是穩定軍心，在戰爭歷史的層層覆蓋下所折射的時代身影，紛紛讓儀式行為顯現於日常生活之中，連貫於個人生活與國家生活。於是我們覺察臺海兩岸實質的軍事征戰依舊是互有消長，國慶儀典的象徵意義如何詮釋，仍是與現實的社會氛圍，傳遞政治訴求的精神能量有所連結。其中閱兵儀式，既是「祀」，也是「戎」，是受之無愧的國家大事。因此，在國慶儀典中的官方動員，「閱兵」、「集會」、「遊行」在年年反攻大陸的戰鬥氛圍下，早期頻繁的國慶閱兵所形成的儀式性行為，仍是以鼓舞民心、展現軍備實力的象徵性功能與儀式性功能為主。

「國慶儀典」的儀式過程可分為兩種發展途徑：其一為官方慶祝儀式。猶如中樞紀念、領袖文告、閱兵儀式、國慶大會，可視為官方重要集會活動，是官方利用國慶儀典鞏固政權，形塑人民對於政府的向心，並將權力展示於國慶場域。其二為民間慶祝儀式。尤其是以民間籌組的各式遊行及表演隊伍，透過身體聚眾，旗海簇擁，街道遊行，成為國慶表演的一部分。換言

---

<sup>1</sup> 據《左傳》記載，宣公十二年，晉國與楚國發生邲之戰。楚國雖為戰勝國，卻不願在國內大肆慶功炫耀戰功，楚共王乃以「夫文，止戈為武」之意，說明「武」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合眾、豐財者等七德，運用武力在於禁暴息兵，反對窮兵黷武。

之，國慶儀典具有展示政權統治正當性的意義，大體上是由閱兵、集會和遊行三者交錯運用，藉由升旗典禮、閱兵、遊行、儀隊表演、民俗遊藝活動，營造國恩家慶的節日氛圍。

蔣中正與蔣經國的執政時代，在國慶儀典上仍然可以見到這類護持總統肖像的隊伍在街道遊行的盛況。此外，在國家重要慶典場合中從不缺席的閱兵儀式，其軍事訓練的身體姿態對國家與社會的群體記憶至關重要，它可以展現強大軍事力量的存在，亦可增強國家的認同與執政者的合法性。於是，國慶儀典能永續地傳承下去，正是借助國家政權的建立，以及將固定的儀式精神內化為國民的潛意識之中，然後通過重複性的身體操演，建構國家化身體，整合一定程度的社會價值觀。

本文以身體作為線索去探究閱兵儀式的權力演出，藉由反共抗俄時期閱兵儀式所形構的權力展演、身體意涵，進一步思索個人身體隨著社會境遇變化下改弦易轍的空間與政治。「國慶」是國家最重要的儀典活動，它是一個建國初始的印記與政治象徵。解嚴前官辦的國慶活動，所營造萬眾一心的現場氛圍和莊嚴的儀式感，是一段國族歷史的縮影，本文希冀以技藝下的閱兵身體為觀察視角，從閱兵儀式中的表演／儀式行為，探索表演者的身體性，進而建構閱兵儀式的原型。接著本文將以廣義的「表演」論述，探討閱兵儀式的表演，以及建立在這種經驗上的身體理論來解釋軍事身體生成。另一方面則重新檢視閱兵身體的空間化發展，梳理展演空間如何在身體踐履的過程中，產生戲劇性的質變。

## 貳、儀式表演與身體踐履

本文將以軍事身體踐履來觀看閱兵儀式的歷史演變，藉著觀看 1949 年後的臺灣國慶儀典過程，梳理閱兵儀式是如何透過對軍事身體的操作，藉隆重的閱兵式、分列式，激發參與者的集體記憶與國家想像。同時析論軍事社會化的建構與身體規訓，是如何體現在國家慶典與國慶閱兵這樣的政治儀式上。此外，本文也將從閱兵儀式中的表演／儀式行為，探索表演者的身體性，進而重構閱兵儀式的原型。

## 一、複刻：軍事化與紀律化的身體表徵

服兵役的辛苦其實不單是身體上的規訓，甚而是精神與心境上的試煉成長。當兵儀式的成年禮讓臺灣役男服役經驗，藉由儀式性的離群索居，過著儉樸、低物欲的部隊生活，從事行軍訓練、體能戰技、勤務支援，模塑軍事身體馴化為理想的軍人形象時，不僅改變了役男的心智意念，也在役男抗拒、轉碼，接受的過程中逐步生成，進而讓身體形象更符合期待價值，肯定軍事化的自我。我們可以清楚觀看到臺灣軍事社會關係與服役制度的成型，及其身體經驗所反映在「軍事化自我」與源自「民間自我」之間存在的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另一方面，軍事化的操演強調集體行動、動作一致，這種與日常截然不同的人生體驗，通過封閉的軍事環境與大量的身體鍛煉，驅使役男在不斷操練之中，復刻軍事化和紀律化的身體表徵，重塑軍事身體的「慣習」(habitus)。

國民政府遷臺後，延續統治中國時期的政治與軍事經驗，將德國、蘇聯、日本等近代步兵操典進行跨地域的學習。以軍事規訓下的「閱兵儀式」訓練為例說明，所謂的閱兵儀式，不僅是軍事活動和慶典活動，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活動。「閱兵」作為一種彰顯榮耀與警示意味濃厚的政治儀式，在國家慶典的舞臺上，通過軍隊的操演和軍力的展示，將國家的民族精神，社會文化理念彙集成一種聲音，藉由國慶閱兵、三軍樂儀隊等閱兵行為與儀式操練過程，以身體規訓、情感表達和儀式性展現其合法性建構。

軍隊既是國家武力的象徵，閱兵儀式則是官方將部隊、戰士集合在特定的場域之中所進行的校閱行動。觀看臺灣 1951 年到 1964 年間的閱兵場域，其中 1952 年 10 月 10 日雙十國慶，蔣中正在總統府前進行閱兵，此刻也是駐守金門的國軍對中共據守之南日島發起突擊作戰之日。像這樣在瀕臨共產黨血洗臺灣的陰影下，透過閱兵行為宣示臺灣仍具備反攻復國的能力，也相繼成為安定民心的力量。確實，以身體作為出發點反思身體軍事化的建立，軍事作為一種政治治理的過程，所衍生的是戰爭如何形塑社會，而社會又是如何記憶戰爭的微妙關係。傅柯認為身體是政治的立場(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權力可以挹注在身體上，予之訓練、組織、挹注、強迫它行使某些功能(Michel Foucault, 1979: 25-27)。傅柯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國慶閱兵的政治儀式正是權力的一種展現方式，源自於一種對權勢的執念，亦是一

種誇大及符號化的指涉。於是我們得以在國慶閱兵儀式中，窺視權力儀式下的卡里斯瑪(charisma)<sup>2</sup>，正悄然以象徵性與表演性的形式再現軍事身體的跨文化現象。

## 二、身體與政治：跨國界與跨文化的身體現象

中國近代身體軍事化的啟蒙階段，約莫在 1880 年，於上海「丹桂茶園」搬演同一題材的《大清得勝圖》，然後在 1893 年「天仙茶園」鼓師趙嵩壽與三麻子王鴻壽重新編排連臺本戲《鐵公雞》，這齣描寫太平天國與清廷錯綜複雜的武裝鬥爭，透過京劇藝人的身體，「著清裝，化妝不勾臉，帶改良髻口，武打使用真刀真槍，並有洋槍操練等特技表演」（徐亞湘，2006：87），我們可以從身體訓練技藝的視角發現，清末戲臺上所演繹的這齣時裝戲，可謂是身體的軍事性表演，同時也是現代性的政治對藝人身體的啟蒙過程。

當然，在接下來的身體技藝中，跨國力量與外來因素滲入中國近代身體，特別是 1895 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以德國操典作為教範，進行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分列式演練，也就此宣告中國步入跨國身體軍事化歷程。從表面上看，德國軍事操典所進行的身體訓練，除了將步法、陣法、手法、口令等範本引進中國，形塑具備紀律與效率的軍事身體外，更將德式裝備與訓練體制遷徙至臺灣，構成 1950 年代國民黨建軍備戰的基礎模型(黃金麟，2009：116)。

由 1949 年蔣中正在臺期間官辦的 11 次國慶閱兵，以展現壯盛軍容的閱兵行為來看，可以清楚觀看到國軍閱兵踢正步的跨國界、跨文化身體脈絡。儘管當年國民政府已經成為二次大戰同盟國的一員，但是軍隊操典方式明顯地受到德式軍風的影響。以行軍正步的步速每分鐘 120 步的角度來看，國軍分列式的步姿仍與軸心國的閱兵正步相同，並未刻意洗去德國對臺灣軍事身體復刻的記憶。

特別是國軍正步採右手托槍，步姿採取德國式的正步走，然而甩槍、擺手、敬禮、變換隊形，卻又呈現美國、英國式輕快活潑的花式動作與操作指

---

<sup>2</sup>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卡里斯瑪」(charisma)效應理論，認為某些人格特質具備著超凡、神聖、英雄氣概、犧牲奉獻的卡里斯瑪式領袖傾向。但這種神聖特質較為短暫，可謂一種權力過渡時期的產物。

令。臺灣軍事身體經由操演程式，轉化為閱兵儀式展演中的視覺符號，從這些舉手投足間的軍事動作中，我們看到的是軍事身體孕育的痕跡，以及集體形象所迸發出極為崇高的榮譽感。

作為一種政治儀式，國慶閱兵曾經在臺灣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閱兵儀式不但是通過權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工具，亦是實現軍事身體建構的軍事活動。實際上，閱兵儀式的兩大行動範疇，其一為「操練」，規訓軍事身體的技藝；其二為「表演」，隱含情感的表達與詮釋。它將國家、社會和個人以及歷史、現在和未來整合為一個政治意義上的統一體，通過富有滲透性和感染力的「儀式化」行為，構築起日常生活的實踐過程。由 1950 至 1960 年代形同軍事機密的「光華演習」、「光復演習」、「中興演習」、「復興演習」、「復漢演習」、「興漢演習」、「鼎興演習」等軍事演習來看，以軍事的身體作為政治事件的發生要件，政治力對軍事身體的干涉與凝睇，經由國家所形成的身體變化，可以清楚觀看到規訓性權力的存在。不僅如此，國慶閱兵如實地反映出政權更迭與政局變化的脈動，同時也照見了掌舵的執政者對微型政治的行使，以及表演者的身體所授予的馴服與規訓。

儀式行為的建立，自中國漢朝就有著類似的閱兵制度，歷經唐朝、宋朝以漸進的軍事訓練方法，逐步形成閱兵訓練的重要形式，接著在明朝以步兵突擊、步騎合擊等操演奠定軍事科目，然後在清朝形成多種閱兵操演形式<sup>3</sup>，這是為什麼中國歷代王朝的閱兵儀式與國家體制存在著必然的內外關係。演變至今，閱兵儀式已被塑造為展現國威、宣揚軍威的重要形式。

於是，透過對軍事身體的操作，輔以隆重的閱兵式、分列式激發參與者的集體記憶與國家想像，既重構閱兵儀式的原型，另外，閱兵表演不僅被視為戰爭勝利凱旋的軍事舞蹈，帶有明顯的功利目的，與此同時，閱兵步法也是一種儀式舞蹈，像芭蕾舞，踢踏舞，表達一定的生活理念，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氛圍。一般認為，國際間的閱兵正步主要分為三個流派，普魯士的「德式正步」率先而起，逐漸傳到南美國家，由於這種閱兵正步的納粹印記過於鮮明，二戰後便逐漸式微。「英式正步」來自皇家御林軍的閱兵儀式，

---

<sup>3</sup> 明朝朱元璋重視部隊訓練，頒訂《教練軍士律》，其制度賞罰嚴明，奠定日後軍事訓練的品質。另清朝的閱兵形式多元，尚包括軍容、軍技、軍學、軍器、軍陣、軍律、軍壘等各項閱兵方式。

多為英聯邦國家採用。「蘇式正步」是第一個引進德式正步的歐洲國家，步姿經修改成俄式走法後，多為社會主義國家採用。

### 三、閱兵訓練：操演－閱兵－再操演

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軍校生多次參與校內閱兵儀式的操演行為觀之，對參演者而言，參與閱兵訓練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跨越身分、重新定位的新關係。閱兵訓練初期，「校旗隊」、「軍樂隊」、「操演部隊」的訓練方式儘管殊異，但是正確而完美的閱兵儀態是閱兵成員的基本要求，也因此成為挑選閱兵成員的一項重要指標。確實，儀態規範包括站立的姿態，行走的步履，說話的聲音，臉部的表情等，透過內在素養的真實表露，可以展現動作姿態、行為舉止，甚至影響國軍整體形象。正因為儀態姿勢對閱兵訓練的影響非常重要，不正確的姿勢將會影響人體的正常功能，以雙腿與兩足的施力點來說，行立正姿勢，兩膝內側若不能靠攏併齊，形成 O 型或 X 型腿，抑或是足弓不明顯、兩腳尖向外張，都會影響走路的穩定度。

以「校旗隊」為例說明，擔任校旗護衛槍兵，平均身高須在 175 公分以上，從擔任「門侍」開始，接著在進行閱兵分列時，以「標兵」之姿站在司令臺兩旁的「標兵臺」，作為進行分列式部隊行進時的標竿，之後經過養成訓練後始成為「校旗護衛」(圖 2-1)。在自主訓練過程中，其中標兵「站半階」目的，是為了訓練腿力，聽聞口令，踏上路沿石，接觸地面約 1/3 的腳掌，後腳跟踮起，與立正姿勢相同，腳尖分開 45 度，兩腿挺直，兩膝靠攏並齊，需夾腿，身體稍向前傾會較好保持平衡。另外，標兵在「踏標兵臺」之前，會在地面上練習步伐及練習「假」持槍及持槍(圖 2-2)、(圖 2-3)。



圖 2-1 校旗隊置重點於擺手、抬腳、旗桿高度一致、轉彎維持班面整齊。(政戰學院)



圖 2-2 「標兵」站上「標兵臺」



圖 2-3 「踏標兵臺」練習持槍動作。(政戰學院)

有別於一般閱兵部隊的持槍訓練，「軍樂隊」隊員手持樂器，除了身上背負近 10 餘公斤的器材，進行基本教練，再加上以站姿進行耐熱訓練，皆考驗著隊員的體能、精神、意志及耐力。閱兵行進間，在敬禮樂、從戎樂、將軍樂、閱兵式、啟奏鼓、分列式、從戎樂、閉幕樂等曲目引領下，在「指揮」變化特定的手式來指示全體隊員進行下一個動作時，通常搭配有節奏感

的哨音，如(圖 2-4)的排練過程中，在一長音一短音〔起步走〕、一長音〔踏步〕、一長音兩短音〔立定〕、哨音結束後依長音拍數 2 或 3 拍上下樂器等方式等例行訓練外，再分別進行閱兵式與分列式的操演(圖 2-5)。



圖 2-4 軍樂隊從曲目、哨音、指揮、隊形進行操演。(政戰學院)



圖 2-5 軍樂隊進行分列式操演。(政戰學院)

在「操演部隊」方面，為了準備閱兵訓練，從單兵基本教練要求開始，進入到班、排教練，最後進行「閱兵式」與「分列式」。不分晝夜勤訓精煉，其目的是維持「五條線」的整齊劃一：帽線、槍線、胸線、手線、腳線，是構成徒步方隊的基礎。這五線的嚴格訓練，有助於受檢部隊在校閱時彰顯鏗鏘有力的步伐，井然有序的動作，類似鐘擺運動的精準、到位的美感(圖 2-6)。



圖 2-6 閱兵練習重點為槍線、手線對齊、動作時機、步伐大小頻率須一致。(政戰學院)

在「正步」訓練過程中，閱兵肢體的動作愈多，手腳擺動的幅度愈大，訓練的困難度愈高。閱兵操演的訓練步驟，首先由「單兵持槍」基本教練開始，第一種訓練模式是「持槍立正」、「稍息」、「托槍」、「槍放下」，第二種訓練模式是「持槍敬禮」，「上、下刺刀」、「跑步」、「立定」。接著進入「部隊教練」，第一種訓練模式除了訓練「班」、「排」教練之編成，並依序完成「隊形」、「整齊」、「報數」、「行進」、「變換方向」、「變換隊形」，第二種訓練模式則是模塑「閱兵動作練習」、「閱兵齊步分列」。可以發現受檢部隊從接受操演到參與閱兵，之後再回到軍事操演的歷程，類似於人類學中「操演—閱兵—再操演」<sup>4</sup>的通過儀式。

對閱兵儀式的參演者而言，投入閱兵儀典的歷程，將旋即進入「中介」狀態當中，個人將處於身分／角色／自我意識模糊的狀態，經歷著轉變和轉化的身分與歸屬的改變。特別是閱兵分列訓練過程的艱辛，除了加重靜態的訓練外，編隊集訓的反覆演練，造就了眼神、表情、口令、敬禮、姿態等身體上的慣性與默契。這一切的付出，皆是為了履行革命軍人在閱兵場上的「接受操演」，「投入閱兵儀典」，「再接受操演」的軍事洗禮。

<sup>4</sup> 依據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所提出的「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理論，認為人類在儀式過程中將經歷「分離(separation)—中介(Liminal)—整合(incorporation)」階段，抑即是人類在生命中所經歷的社會或生理階段，都將被過渡儀式標誌著，而讓個人可以在儀式過程中，游離出最初的社會結構生活，接著進入過渡階段，然後在儀式過程結束後復回到最初的社會結構，最終進行整合的過程。

## 參、權力表演視閥下的閱兵身體與空間展演

本文從「表演」這一概念梳理，認為廣義的表演論述可以是儀式、舞蹈、球賽、運動、戲劇治療、前衛表演等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至於國軍的閱兵儀式行為，即是謝喜納所謂儀式就是動作，就是表演(ritual as action, as performance)，因此，筆者將透過儀式與表演的關係，檢視二者互包中又彼此殊異的狀態，同時關注軍事身體中的儀式行為所具有的表演性質。本文希冀以廣義的「表演」論述，探討閱兵儀式的表演，以及建立在這種經驗上的身體理論來解釋軍事的身體生成。

### 一、我是我／非我的閱兵身體

就讀海軍官校的黃河(本名黃征輝)，曾經以軍校生的身分，參與蔣經國就任總統後的首度國慶閱兵。在「漢威演習」閱兵儀式的安排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官校學生黃河所呈現的閱兵經驗，以表演行為來探索表演者的身體性，卻發現軍事劇場中的軍校生所經歷的「意識的轉化」其實皆是暫時性的「轉變」<sup>5</sup>：

當年國防部決定舉辦國慶閱兵，海軍官校正在放暑假。為了準備閱兵，原本二十一天的暑假縮短到十四天……於是南臺灣燠熱的夏季，我們提前返校，開始日日接受嚴格的正步訓練。每天只上半天課，每天下午都是操練時間。大夥先從單兵基本動作練起，然後是整班、整排，最後是整個隊伍一起練。練不好的隊伍晚上得加班，練不好的個人周日留在學校繼續練……(好讀網，2015. 12. 04)。

---

<sup>5</sup> 甚麼是「轉化」呢？根據謝喜納的說法，轉化意指「存有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being)或「意識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其中在「意識的轉化」分面，謝喜納將其分為兩種：永久性的「轉化」(transformation)和暫時性的「轉變」(transportation)。而「轉變」則較常發生在世俗的儀式或娛樂的表演時空當中。Richard Schechner,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 85), p.4-14。另參酌自鍾明德〈轉化經驗的生產與詮釋：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一文對「轉化」意義之詮釋。

檢視軍校生參與的閱兵儀式時，會發現一個較以往不同的觀看視閥：軍校生在閱兵場域上既是角色扮演中的「戲劇演員」，亦是透過軍人身分扮演「社會演員」。雙重身分將使他產生「表演」／「儀式」兩種變化。若從「表演」的觀點來看，在表演前，軍校生必須卸下他在日常生活中原來的自我，開始逐一檢整閱兵制服、服儀配件、操槍操旗、正步訓練等事宜，直到表演前一刻的暖身，軍校生轉換情緒後進入戲劇演員／社會演員的角色，然後進行操槍操旗、踢正步的正式演出，直到閱兵儀式結束，表演者才在觀眾的掌聲中回到自己原來的狀態。

可以說，這是一個從日常生活中的「我」(軍校生)，經過有意識的角色扮演並與角色合而為一的「我／非我」(戲劇演員／社會演員)階段，只是這些階段的變化是暫時性的，也就是當閱兵儀式結束後，表演者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原來的自我。相較於這樣一種變化，黃河的閱兵經歷與身體的展演，也許和當年許多青年男女所組成的閱兵隊伍一樣，共同參與總統府的國慶閱兵活動，那是在非日常生活下所交織歷練的生命經歷，成就著揮汗耕耘終有成的感動，也是一個操控自己的身體成為公眾所關注的焦點，因應國家認同的需要，而熱切參與的集體行為。

追憶當年參加國慶閱兵的日子，細述隊員參加國慶閱兵受訓的整個過程，軍校生的身體在經歷單兵基本教練伊始，便逐步要求立正姿勢、稍息姿勢、向左轉、向右轉、向後轉、持槍、端槍、托槍、上下刺刀的基本動作。接著進入班兵訓練、區隊訓練，務必力求兵與兵、班與班的距離一致，並逐一檢視班兵個人的托槍、擺手定點動作的整齊劃一。經過數週的模塑與整合隊伍後，由隊長領軍發號施令，再配合閱兵音樂作行進間的重複演練，最後進入實兵驗證的緊鑼密鼓階段，閱兵隊伍則依序進行通過閱兵臺之向右看、向前看及聽訓隊形的重複性演練。當然在排練的過程中，表演者會暫時以「離開自己」的方式執行表演，這樣的改變不僅發生在儀式情況下，也同時發生在美學表現上<sup>6</sup> (Richard Schechner, 2002: 64)。我們可以將這一段閱兵表演的轉變過程，視為短暫的轉變(transportation)。

---

<sup>6</sup> 改變不僅發生在儀式情況下，而且發生在美學表現上。事實上，這是所有種類的表演融合在一起的地方。舞者，運動員，舞蹈家，薩滿，藝人，古典音樂家……所有的訓練，練習或排練，以暫時「離開自己」的方式執行表演。

也就是表演者往往處於一種雙重否定狀態，亦即是表演者往往置身於「中介」(liminal)狀態之中，被轉變／離開他自己，但是他既不是扮演的角色，亦不是處於不是扮演角色的狀態——他正在扮演。直到表演結束，他才在觀眾的掌聲中回到自己。就表演者而言，他即是以一種雙重否定(double denial)、「不是他自己」(not himself)也「非不是他自己」(not not himself)的角色特質呈現演出氛圍下的某種精神狀態。

## 二、反結構狀態下的閱兵訓練

當我們以「儀式」的觀點來檢視軍校生參與閱兵儀式的雙重身分，亦即是當軍校生／戲劇演員／社會演員一旦經過中介階段，即代表閱兵儀式已完成，尤其在參與國慶閱兵期間的正步訓練，猶如中介表演中的「轉變-轉化」過程：

南臺灣的七、八、九月，不要說扛把槍在操場踢正步，即使只是一動也不動的原地站立，二、三十分鐘，鼻頭也會冒汗、四、五十分鐘後便汗流浹背。如此漫長的日子，如此辛苦的訓練，其目的不過是努力保持「四條線」<sup>7</sup>的整齊劃一地移動(好讀網，2015.12.04)！

總體來說，軍校生／戲劇演員／社會演員，它既是閱兵儀式的參與者，與此同時，也是一位表演者，在參與正步訓練過程中逐步進行著「意識的轉化」。只是，為何參與閱兵儀式的表演者能在如此漫長的日子，如此辛苦的訓練下模塑自我？又為何他們為了維持踢正步的整齊劃一而保持著「四條線」或「五條線」的訓練技巧？試想，若不是個人的心理素質建立起堅定的意志，抑或是參與團體萌發的革命情感進而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這些在重要慶典活動所舉行的閱兵儀式，所衍生的一個非日常現象，能從最初逃避疼痛與苦難的「自律」過程，到最後接受疼痛與苦難的「他律」過程，對於處在中介階段的參與者與表演者來說，他所體驗到的「合一」感受，是盡己之

---

<sup>7</sup> 踢正步的要求重點分別為「四條線」：槍線、胸線、手線、腳線須整齊劃一地移動。另「五條線」則包括槍線、胸線、手線、腳線、帽線。無論是四條線或五條線的訓練技巧，對單兵個人極不容易練習，若隨著排面班兵的人數增加，如何訓練排面維持「一線」的難度，勢必將急驟攀升。

力完成任務的喜悅之情。進一步關照閱兵儀式的中介表演，我們可以發現，閱兵儀式即是一種相對於日常結構的「反結構」狀態(Anti-Structure)<sup>8</sup>。

以閱兵儀式而言，儀式過程中所經歷的中介階段，所有參與者是平等的，沒有身份地位的差異，它既顛覆參與者原有的社會歸屬與身分認同，將參與者從日常生活的限制當中釋放出來，並賦予新狀態的能動性，可謂反結構的部分。對這群來自軍事的身體，不僅是文藝戰線的接受者，傳播者，同時是朝著理想邁進的實際戰鬥員，可以說三個多月的閱兵儀式訓練，其實就是一個燃燒熱情、狂歡與嚴肅交織的過渡狀態，而處於這種「反結構」的中介狀態，的確讓參與者體驗到：

對於曾經參加國慶閱兵的官校學生而言，那不僅是刻骨銘心，根本就是火印一般烙在心頭……聽到閱兵隊伍嘹亮的「敬禮」聲，霎那間仍讓我渾身一熱、鼻樑深處一酸。那是多少汗水累積出來的榮譽啊(好讀網，2015.12.04)！

參與閱兵訓練的過程，除了感受到肉體的疼痛與磨難，諸如閱兵制服規範下的紀律與服從，閱兵動作與齊步分列的技藝傳授……皆能親身體驗神秘力量(Continuous reference to mystical powers)所帶來的轉化體驗。

### 三、儀式行動與「轉化」經驗

「閱兵表演」可以是生命過程中一次重要的「轉變」經驗，「閱兵儀式」可以是個人通過特定的儀式行動而產生的「轉化」經驗。而這些正步走、齊步走、閱兵式、分列式的各種形式表演，賦予我們共同的存在意義即在於，通過演繹軍事技藝、閱兵秩序的界線，繼而進入不同於日常自我的自我，甚至為自己與他人帶來暫時的改變。與此同時，在經歷閱兵訓練中的各種試煉與考驗，面對個體性的崩解，從個人「手、腳揮動時手肘與膝蓋不能彎曲」、「必須筆直地像一根木頭上／下、前／後擺動」，到符合群體「正步已有一定水準，團隊默契也夠，訓練強度因而減弱許多……訓練變得有意思起來」(好讀網，2015.12.04)。

---

<sup>8</sup> 本文引用特納所提出的「中介與合一」(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是建構「轉化」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特納用來闡釋通過儀式的中介階段：分離(Separation)、中介(Liminality)、團圓(Reaggregation or Reincorporation)的三個階段。在特納看來，社會被歸屬於結構(structure)與反結構(Anti-Structure)，是固定世界與流動世界辯證下的產物。

由此可見，閱兵儀式在個人與群體兩者的聯繫上，以永不放棄的堅強意志，讓日常生活層次的能量昇華至更高的鏈結(the higher connection)，達成身心超越的非日常存有狀態。這樣的一個轉化儀式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機制，猶如將個人移轉到群體的結構當中，並且轉化個人的主體性，亦即是通過閱兵儀式／過渡儀式的洗禮，讓個人的存在意義，重新聚合(re-aggregate)到軍事社會化的體系當中(Richard Schechner, 2002: 65)。

## 肆、空間戒嚴與閱兵儀式

空間是權力彰顯於外的歷程與產物，以閱兵儀式做為一種盛大而重要的政治慶典，固定的展演空間可以被視為觀察軍事身體生成的觀點<sup>9</sup>。換言之，檢視閱兵身體的空間化發展，探究其展演空間的發展如何與身體的生成產生聯繫，特別是紀律如何透過空間的縝密安排而獲得實質的體現，此為本文亟欲探討的一則現象。另一方面尤須正視身體的空間化發展，如何透過群我關係以身體的實踐來轉換空間的問題，也就是展演空間如何在身體踐履的過程中產生戲劇性的質變，以及這種質變隱含了甚麼樣的身體變化，則是本文持續關注的議題。

### 一、儀式空間與權力展演

觀看臺灣的空間戒嚴與權力的關係，傅柯的全景敞視建築式監獄(panopticon)觀點<sup>10</sup>，提供了我們思索空間與身體生成的依據。基於空間在任

---

<sup>9</sup> 傅柯(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中關切身體規訓與社會論述權力的關聯性。他的權力分析主要從「身體」被構建的型態出發，將身體訓練成為一個馴服的工具。此外，他將空間作為一種權力規訓技術，佐以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例證，透過監視等權力技藝的模塑，藉此體察一種既溫馴又具生產性的身體狀態。也就是說，傅柯的論述架接了「社會／論述／權力」及「自我／技藝／身體」兩者間的內在聯繫，指陳身體技藝展現的背後所欲彰顯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思維。

<sup>10</sup> 傅柯是從政治的角度，從統治技術的觀點來闡釋空間和人的關係，亦即是權力是如何借助空間而產生作用，以及空間又是如何展開它自身獨特的權力實踐。無疑的，以身體作為規訓的依據，傅柯將空間視為一種權力規訓技藝，有意識地涉足空間問題的研究，在《瘋癲與文明》中考察「禁閉」的源起，18世紀末的英國、德國、荷蘭等國，假「治安」

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甚至空間在任何的權力運作中也相對重要，因此，在這個空間與權力關係的討論中，環伺於總統府、廣場、周邊道路的空間設計，促使監視(surveillance)成為權力的一個持續效應。正因為空間是權力彰顯於外的歷程與產物，以閱兵儀式做為一種盛大而重要的政治慶典，固定的展演空間可以被視為觀察軍事身體生成的觀點。從臺灣閱兵儀式的政治空間觀之，昔日象徵國家權力的「臺灣總督府」過渡到政治戒嚴時期的「介壽館」，壯闊莊嚴的建築物猶如是象徵國家身分的顯影。「介壽路」的地景塑造，可視為人民向政治中樞表達效忠的廣場，至於介壽館的「閱兵臺」可謂政治權力象徵的表演場域。

臺灣自 1949 年起，每年 10 月 10 日皆會舉行國慶大典與國慶閱兵。昔日閱兵作為傳統軍事儀式，以田獵方式發展演變至今，漸次形成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政治儀式。閱兵儀式行為通常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進行展演，諸如藉由總統府前的南北廣場，遊行動線，校閱部隊，觀禮群眾，在國家慶典的舞臺上以軍事展演之姿，宣揚反攻大陸的意識形態，藉由閱兵作為一種彰顯榮耀與警示意味濃厚的政治儀式，再次銘刻社會潛意識與集體記憶。

閱兵作為一種儀式，它的原型來自宗教與圖騰。儀式作為一種具有意義的活動，其要點就是象徵意義(Paul Connery, 2000: 49-51)。「象徵」確實賦予儀式行為更為重要的意義，誠如威權時期的國慶閱兵，校閱者揮手致意和受檢者向閱兵臺敬禮，二者間所體現出權力的彰顯與馴服，則是另一個觀看權力階級劃分的絕佳視角。在布迪厄看來，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階級與階級，團體與團體，或是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所賦予的權力關係，經由象

---

(police)之名，讓禁閉徒增隔離之實。其中醫院、拘留所、監獄的創立，看似提供一個新的歸宿之所，囚禁了一群違反習慣法者、家庭浪子、無業遊民和精神病人於同一大牆之中，可以說禁閉已成為各種濫用權力因素的大雜燴。傅柯從權力運作及發生作用的場域—監獄、精神病院來探究權力化的空間配置(configuration)，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紀律社會，而空間遂成為權力運作的重要媒介與場域，無論是學校、軍營、工廠、醫院的空間皆可以是權力實踐的重要機制，由此可見，空間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同時也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此外，傅柯更視監獄為規訓機構的典型案例，並將監獄比喻為「靈魂」。這個靈魂的機制體現了權力的意圖，與此同時，傅柯借助監獄這個空間概念，構作了龐大的監獄體系，抑即是將監獄、醫院、教養院、軍營、懲罰劇場……將之整合在國家機器與社會機構之中，然後達到干預人體的目的，貫徹權力的意志。

徵暴力的行使，將這些象徵與意義的系統加諸於某些階層或團體之上，皆被視為是合法的權力<sup>11</sup> (Bourdieu, 1977: 4)。

## 二、權力的彰顯與馴服

因此，當親任大閱官的校閱者，俯視閱兵臺下的受檢部隊或群眾，引領眾人覆誦軍人讀訓、政治口號震天嘎響之際，除了感受旗海、領導人畫像、政治標語，珠貫棋布井然有序，再加上地面坦克部隊與空中戰鬥機群完美配合，所營造的政治空間均被臺上的校閱者、陪閱者盡收眼底一覽無遺。接著校閱者登上校閱車，在統帥旗車的引導下開始閱兵，一路上民眾投以熱烈的掌聲向總統致敬。儀式中的校閱者揮手致意和受檢者向閱兵臺敬禮，二者間所體現的不啻是權力的彰顯與馴服。

對受檢部隊和觀禮群眾來說，所謂「可見的」(visible)，即是他們不斷地接收總統府這棟建築物的莊嚴氣勢，當政治宣傳口號迴盪耳際直入心坎，建物與道路周圍廣場紛紛響起總統萬歲的歡呼聲。對臺下參與者而言，當「國防部示範大樂隊奏起了崇戎樂，滿臉慈祥的總統及夫人，一面緩步走上陽臺，一面向群眾揮手，廣場上期待已久的群眾，這時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總統萬歲』、『總統萬萬歲』的歡呼聲，在這個周圍約有兩公里方圓的廣場上響了起來，大家都揮動著手裡的國旗，忘情的把他們內心對總統的欽敬之情，全部表達在熾熱的歡呼上面<sup>12</sup>」。的確，他們正欣賞著猶如政治劇場中的權力展演，端詳著閱兵臺上的王者風範，然而領袖者的姿態樣貌卻因距離遙遠，更顯得影影綽綽觀看不清。

顯然，對於場上的政治領袖的想像取代了視覺感知，抽象(abstract)的政治尊榮取代了具象(concrete)的領袖樣貌。在這樣的儀式慶典中，卡里斯瑪現象說明了參與者對於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普遍認知，以及對英雄崇拜、對領袖絕對信任的完全獻身。無疑的，當年介壽館廣場儼然成為參

---

<sup>11</sup>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任何運用象徵暴力的權力，都會將它所特有的象徵力量加諸在權力關係之上。抑即是將每一個藉由隱藏作為力量基礎的權力關係來強加其意義，並將它們訴諸於合法的權力，賦予其合法性。Bourdieu, and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1977), 4。

<sup>12</sup> 中央社，〈金馬臺澎地區代表國慶日向總統致敬 行政首長民意代表齊集臺北呈致敬書表達全民愛戴赤忱〉，《聯合報》，1961年10月9日，第1版。

與者近距離感受國家領導人風範，以及接受國家政治教育馴化的儀式性場所。

隨著官方進行國慶儀典的政治動員，支配龐大的人力物力來舉辦國慶盛宴，各級機關、商家、學校紛紛懸掛國旗、標語、總統玉照，處處張燈結綵喜氣洋洋。解嚴前的臺灣社會，長期被定位為一個「打倒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的中興基地，國家權力賦予反攻復國此一戰鬥目標，無所不在地對社會挹注國族意識型態。總統府建築物、閱兵儀式、政治標語所營造的「記憶場域」(memory places)(Pierre Nora, 1989: 7-24)，以一種反覆灌輸的符碼，營造民眾追思豐功偉業，緬懷國家歷史，試圖延伸家國的集體共識，維繫民眾之於國家的認同感。

於是我們在受檢部隊和觀禮群眾的身上，證實了國家權力往往處於「無法確知的」(unverifiable)狀態，也就是個體身體與心靈空間隨時處於監視(surveillance)之感。相對於執政者藉由軍事展演的方式，演繹起國家機器的權力，在長期塑造意識形態的教化過程之中，國慶儀典或許不過是極其短暫的場域，卻是照見強人政治對於受檢部隊、群眾施以展演場域的監視與身體的控制。

### 三、自我與認同：卡里斯瑪現象

自我(self)是權力肇生的源頭，也是權力技術由個體外部移入個體內部的開始。傅柯認為，無須徒增暴力和有形的掌控，也無必要擴充軍事戰備，只要具備凝視的目光就行了，一種帶有監視的目光，每一個人處在這種目光的壓力之下，皆可能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然後實現自我監禁(Michel Foucault, 1980: 146-165)。上述的論述顯示，當總統府閱兵臺成為政治權力象徵的場域，扮演大閱官的蔣中正在國防部示範大樂隊奏起了崇戎樂，步上舞臺，向群眾揮手，群眾激動地齊喊蔣總統萬歲，我們無法預設這些參與者是自願或強制下產生的情感投射，不過我們也不能低估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相輔相成，賦予大閱官的權力支配。

最值得注意的是，領袖之所以成為領袖，是因為擁護他的群眾支持他？還是權力賦予的權位身分使他的身體和另一個神聖的身體進行結合？克勞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在闡釋「國王的兩個身體」意涵中指出：

國王短暫的物質身體充當了其神聖身體的支撐物，象徵物，或化身；相反，他存在於這樣讓人好奇的事實之中；一旦某個人充當了“國王”，他日常、普通的特性就經歷了一種「實體性改變」，從而變成一個魅力的客體(Claude Lefort, 1988, 19)。

在臺灣社會的符號系統中，「介壽」、「中正」之詞，曾經與臺灣社會的發展命運緊密相繫。蔣中正曾經是權力擁有者也是公共事務幕後的推動者，在這場慶典儀式中所出現的卡里斯瑪(charisma)現象，所擁有「國王的兩個身體」意涵，一則說明了受檢部隊基於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普遍認知，以及對英雄崇拜、對領袖絕對信任的完全獻身。於是乎，當分列部隊精神抖擻地走過閱兵臺，「向右看」的那一刻，他們凝視著閱兵臺上的領導人，以一種軍隊向領袖致敬的悸動心情完成閱兵儀式。

在面對閱兵臺上的總統校閱與凝視，受檢部隊自動將這種權力的監督力量加諸在自己身上，於此，參演士兵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其一是被總統所凝視而壟罩的個體；其二是將總統的凝視，體現在敬禮與回禮的動作之間，最後內化為對自身的凝視(圖 4-1)。



圖 4-1 總統的凝視體現在敬禮與回禮的動作之間。(政工幹校校史)

另一方面，觀禮群眾揮動著手裡的國旗，忘情的把他們內心對總統的欽敬之情，全部表達在熾熱的歡呼上面，的確，他們正沉浸於服從領袖，信任領袖的集體催眠(mass hypnosis)，呈現著情緒激動亢奮狀態(collective hysteria)下的集體行為，猶如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謂：大凡具有社會聲望的意識形態，極少有缺少政治涵義的(Clifford Geertz, 2002: 261)。意識形態裡存在權力的作用，它促使某種認同與意義得以並存，潛藏的是政治力與權力之間的角力競賽。從這個觀點來看，受檢部隊與觀禮群眾，隨著閱兵巡行路線的擴大，以及護持總統肖像的遊行隊伍出現，場上的士兵與民眾既是觀眾也是演員，他們不時的圍觀鼓掌、舞動雙臂揮舞旗幟，不只走在行進的隊伍之中，也融入其中成為國慶表演的一部分。於此，一種意識形態下的集體認知，開始在閱兵群眾之間流轉，反而得以加強政治、軍事宣傳力道。

## 伍、結語

將閱兵儀式置入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可以發現 1950 年代的臺灣，處於風雨飄搖的時空背景，國慶大典與國慶閱兵仍為官方所重視，並在國慶場域中展示權力。事實上，帶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閱兵儀式，在特定的政治節慶日，以軍事身體的聚集與閱兵展演方式，建立起一種政治象徵符號，不單是展示國力，而是呈現兩岸與國際局勢變化，藉此宣示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權，塑造一種群體性價值觀。

誠然，閱兵群體的集體情感愈需要被肯定，就愈需要憑藉隆重的排場、繁複的禮節、壯盛的軍容、領袖的形象……加深臺灣人們的集體記憶，同時藉由廣播與電視媒體的宣傳網絡，擴大閱兵儀式的空間。梳理臺灣政治變遷的歷程，可以發現 1950 至 1960 年間，國民政府受到當前國際情勢與內部環境影響，在臺灣以黨領政，形成黨國一體的政權體制。尤其是當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從直接軍事衝突，轉變為間接政治口號時，「閱兵」的出現即是政治包裝與軍事策劃的結果，除了向對岸宣示臺灣仍具有反攻復國的能力，也以人力、物力的軍事展現向群眾解釋反攻復國大業的意義性與必要性。

本文從「表演」這一概念出發，希冀藉由人類的表演行為與梳理跨學科間的表演脈絡，進而探討政治儀式與閱兵表演的關係，與此同時，筆者以軍

事的身體經驗為研究對象，在辯證「閱兵儀式」與「正步表演」的論述關係時，從閱兵儀式中的表演與儀式行為，探索表演者的身體性，進而重構閱兵儀式的原型。事實上，閱兵儀式中的「操演」階段，彰顯的是身體的規訓與制約，相形之下，閱兵步法的「表演」階段，則隱含著表演層面的抒發，這個內在牽連和衍生的結果，讓我們對閱兵儀式本身具有表演的屬性與特徵，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

在後續的討論中，另一個尚待釐清的課題，即是解釋軍事身體與外在空間、權力支配之間所存在的關聯性。解嚴前，檢視閱兵身體的空間化發展，探究其展演空間的發展如何與身體的生成產生聯繫，我們在受檢部隊和觀禮群眾的身上，證實了個體身體與心靈空間隨時處於監視(*surveillance*)之感，國慶儀典雖然是極其短暫的場域，卻是照見強人政治對於受檢部隊、群眾施以展演場域的監視與身體的控制。與此同時，以身體作為籌碼所進行的一種政治活動，以身體的實踐來轉換空間建立群我關係，受檢部隊、群眾身體的游移與展演，不時顯現在這個空間場域，形成有意識的政治性轉變。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 一、專書

徐亞湘(2006)。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

韓莉譯(2002)。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Clifford Geertz (1977).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納日碧力戈譯(2000)。社會的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aul Connery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Michel Foucault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黃劍波、柳博濶譯(2006)。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人民大學。Victor Turner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 二、期刊論文

王海洲(2010)。政治儀式中的權力宣展與合法性建構－中國社會變革與政治發展中的國慶大閱兵(1949-2009)。學海 4：140-149。

林柏州(2012)。蔣中正在臺時期國慶大典。中正歷史學刊 15：163-212。

#### 三、網頁

好讀網(2015)。閱兵。好讀網：<http://www.haodoo.net/?M=hhd&P=530>。檢索日期：20170103。

### 貳、外文部分

#### 一、專書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assachusetts: UP of Harvard, 1984.
-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Random/Vintage, 1970.
-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1.
-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Bourdieu, and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1977.

## 二、期刊

- Claude Lefort,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19.
- Michel Foucault, M (1980). “The eye of power”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146-165.
-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7-24.